

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Lu Dingyi, an elderly man with glasses,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.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, light-colored wall with some faint patterns.

新闻春秋

(第七辑)

——纪念陆定一同志100周年诞辰
暨中国新闻与传播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
中国新闻史学会2006年年会
论文集

主 编 张国良 副主编 姚欣保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新闻春秋

(第七辑)

——纪念陆定一同志 100 周年诞辰
暨中国新闻与传播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
中国新闻史学会 2006 年年会
论文集

主 编 张国良
副主编 姚欣保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闻春秋.第七辑,纪念陆定一同志100周年诞辰暨中国新闻与传播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、中国新闻史学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/张国良主编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208-07932-8

I. 新... II. 张... III. 新闻学—学术会议—文集
IV. G21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83865号

责任编辑 郭立群

封面设计 杨德鸿

新闻春秋

(第七辑)

——纪念陆定一同志100周年诞辰暨中国新闻与传播理论创新
学术研讨会、中国新闻史学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

主 编 张国良

副主编 姚欣保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21.75 插页 4 字数 418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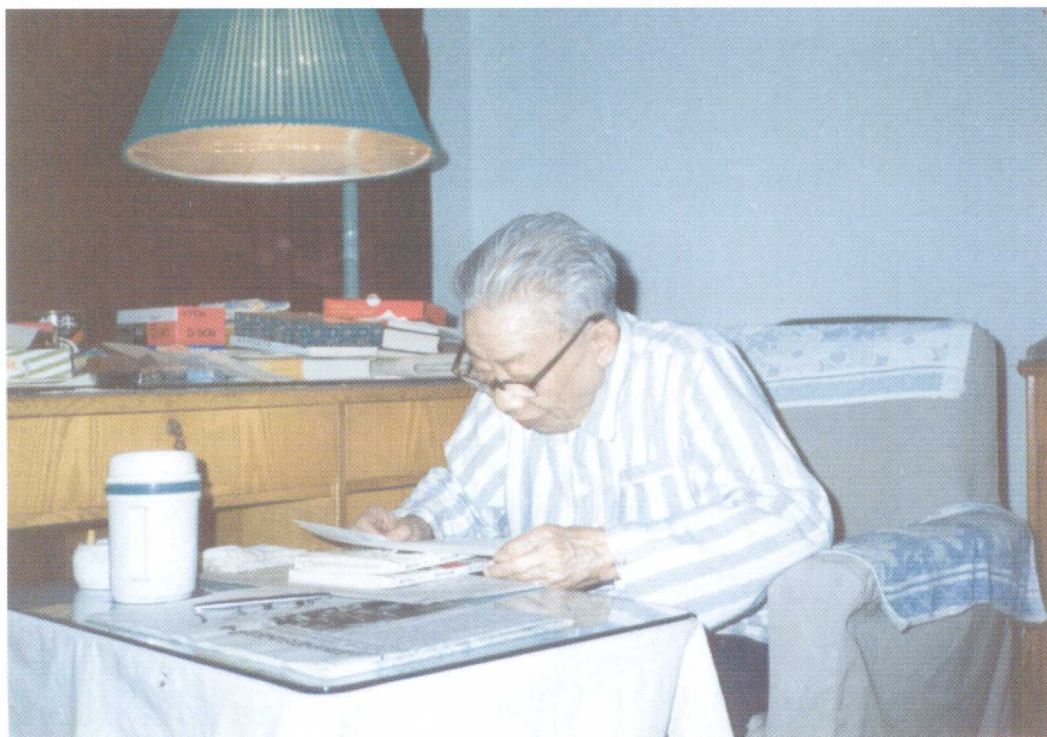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07932-8/K.1456

定价 40.00元



陆定一在中顾委常委会上发言



陆定一晚年生活照



50年代末60年代初陆定一在中南海家中



陆定一严慰冰摄于1959年中南海增福堂



陆定一与陆德，摄于20世纪90年代



打倒“四人帮”陆定一出狱后与夫人严慰冰合影



20世纪60年代初期陆定一全家照

序

张国良

在上海交通大学建校一百多年的历史中，英才辈出，群星璀璨，如茅以升、林同炎、张光斗、钱学森、吴文俊等等，但外界总有一种不尽正确的刻板印象，即认为这所名校培养的人才只限于科学家、工程师，包括我本人也一度这么以为。自 2006 年春天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后，才意外地了解到，其实有许多人文、艺术和社会科学名人出自交大，如邵力子、黄炎培、李叔同、陆定一、邹韬奋等等。

其缘由何在？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，交通大学被限定为工科性质的学校，这恐怕是一个原因；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，上海交通大学作风比较低调，不太善于宣传自己。如果说，这两种情况都曾经是事实，那么，现在看来，它们都逐渐变得不成立了。一方面，进入 21 世纪以来，上海交通大学已决定朝着“研究型、综合性、国际化”的一流大学目标加快发展步伐，陆续建立了管理、经济、人文、法律、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、媒体与设计、外文、体育等文科院系；另一方面，处于当今的信息社会、网络时代，任何一所成功的大学都不能不高度重视对于公众形象的建构，以及对于自身品牌的播扬，惟有如此，才能事半功倍。扩而言之，这不仅是上海交通大学挖掘优良传统资源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需要，也是推动整个社会进一步重视人文精神、提升国民素质的需要。

基于这一思考，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，由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与中国新闻史学会共同主办、上海 99 读书人文化公司协办，于 2006 年 12 月 2 日至 3 日隆重举行了“纪念陆定一同志诞辰 100 周年暨中国新闻与传播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”。其主旨是，纪念陆定一同志诞辰 100 周年，探讨数字时代的中国新闻与传

播理论如何与时俱进,发展创新。

回顾一个世纪来的中国革命史、建设史及新闻传播史,陆定一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是不言而喻的。作为上海交通大学的杰出校友,他于190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,1918年进入南洋中学,1922年以优异成绩升入南洋大学(即上海交通大学),至1926年毕业。在校期间,陆定一即投身于中国革命,是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时间最长(22年)的党和国家领导人,在新闻与传播的理论、实践和管理领域都留下了卓越的建树和宝贵的财富。

正因如此,这次盛会受到了广泛关注。来自全国各主要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知名学者、上海主要媒体机构的负责人、媒体与设计学院师生等一百多人参加,围绕会议主题,提交了丰硕的成果,展开了热烈的讨论。

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叶取源、党委副书记郑成良出席大会并致辞。《陆定一传》的作者陈清泉、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、教育部社科委员丁淦林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、中国人民大学副院长喻国明、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升民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刘建明等权威专家,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。著名报人周瑞金因故不能与会,还专门发来了贺信。

特别令人高兴的是,陆定一的长子陆德先生欣然莅临演讲,并首次披露了陆定一“晚年的几个反思”,及其最终遗言“要让孩子上学,让人民讲话”,使全体与会人员深受感动。

为完整保存这次研讨会思想精华和交流成果,并使之发扬光大,让更多读者有机会分享,我们特意编辑了本论文集,供各界人士参考、指正。在这一过程中,获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,在此深表谢意!

是为序。

2007年12月

目 录

序/张国良

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

——为纪念父亲诞辰 100 周年而作/陆 德 / 001

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奠基人

——浅谈陆定一新闻工作的实践和理论/陈清泉 / 025

陆定一与广播电视/赵玉明 / 032

论陆定一的新闻真实观

——纪念陆定一诞辰 100 周年/郑保卫 / 043

对陆定一唯物主义新闻观的回顾与反思/雷跃捷 高永亮 / 050

《中国青年》与早年陆定一/李 彬 涂鸣华 / 057

办“人民的报纸”

——评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精髓/吴廷俊 裴晓军 / 063

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新闻观, 奠定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基石

——论陆定一的新闻学遗产/张化冰 / 069

坚持科学新闻观 践行“三贴近”

——重读陆定一《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》/张骏德 陈先元 / 075

从文化视角看陆定一新闻理论的基本点/赵为学 戴元光 / 081

试论陆定一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

——以其学生时代的言论为视角/欧七斤 / 087

陆定一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的启迪

——关于新闻人才培养的思考/朱隆泉 / 096

传播效果的心理分析

——兼析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对实现传播效果的中介作用/刘京林 / 099

“创意”与“产业”：新媒介传播环境下创意产业的一些基本问题初探/杨伯淑 吴靖 师曾志 / 104

软实力的提升与版权贸易的转机

——华文出版的挑战、机遇和发展对策/肖东发 / 115

“媒介产业化”十年考/黄升民 / 125

互联网的使用及网民形态的变迁

——2000—2005年中国五城市互联网发展趋势探析/柯惠新 郑春丽 范欣珩 / 140

说了不自说

——论民主化进程中公民权的保障和实施/赵振宇 / 146

中国社会转型呼唤新闻传播理论创新/申凡 丁莉 / 154

当代西方传媒反垄断政策法规刍议/金冠军 郑涵 / 161

数字传媒项目的风险分析/张敏 王惠萍 / 166

中国手机电视运营情况分析/严三九 王虎 / 172

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路径、目标及措施/李本乾 李彩英 周娉芬 / 179

CONTENTS

目 录

1998—2001 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——媒体集团化对于广告产业影响的宏观研究/葛 岩 李新立 / 186

我国报纸艾滋病报道 18 年历程与价值取向演变分析/许正林 祁晨旭 / 201

网民的适应性建构过程与网络事件的成因

——AST 理论视角/郑 傲 / 210

确有似无 若即若离

——解读美国政府对于期刊的管理方式/殷晓蓉 方筱丽 / 219

迈向新闻文化集团

——上海报业媒体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策略探析/张咏华 唐海漫 / 230

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新闻传媒关系论略/丁柏铨 / 243

当前党报集团存在的问题及其体制性求解/詹新慧 / 252

新闻真实性的意义阐释/姚君喜 / 268

科学地把握大众传媒/谢金文 / 280

研究读者是办好报纸的重要一环/潘玉鹏 / 285

走向高度集中的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/李文 曹 红 / 302

附录:中国新闻史学会 2006 年要览 / 309

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

——为纪念父亲诞辰 100 周年而作

亚洲知识管理院士,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陆 德

2006年6月9日,是父亲陆定一诞辰100周年,中央开会纪念了他。

父亲多年负责党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,他提出了“新闻定义”、“教育方针”,并积极推动党中央提出了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方针,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,他是各共产主义政党中担任宣传部长时间最长的人(达22年),是一个马列主义理论家。

父亲晚年,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,进行了反思。我将他的部分讲话和谈话,进行了汇总和整理。父亲虽已去世十年,但他的一些认识和提法,至今仍有着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。

现把父亲的部分反思内容,呈献给大家。

一、如何对待历史问题

——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,应“宜粗不宜细”;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,则应该“宜细不宜粗”。

对历史问题的处理上,中央的政策是“宜粗不宜细”,这是正确的。这是要求从大局出发,认清大是大非问题,统一思想认识,而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,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。应抛弃前嫌,顾全大局,团结一致向前看。

但在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,则应“宜细不宜粗”。总结是为了什么?是为了不再重犯。对历史性的错误,分析得越透彻、越准确,吸取的教训才能越深刻,也才能防止重犯这类的错误。从“反右”、“大跃进”到“文化大革命”,我们党有过多少深刻的教训?“一言堂”,我们又分析过几次了?从分析陈独秀的“家长制”开始,



还不是屡析屡犯,就是不敢触及它是封建主义专制残余。为不重蹈历史的覆辙,认真分析和总结历史的教训,是十分必要的。这是一个“必要条件”。

恩格斯曾说过:伟大的阶级,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,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。敢于承认错误并认真分析和改正错误的党,才是伟大的党。不要怕!周恩来同志是党内最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的同志,我遇见的就不下几十次,但他在党内的威望和人民对他的信任,却是很高的。

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,还不是结束。一个结论是否正确,还需经过时间的检验,才能完成一个历史结论正确与否的全过程。

二、毛泽东同志犯的错误我也有份

毛泽东同志的错误,在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中已经分析了。但毛泽东同志所犯的 error,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,历史不是一个人创造的,我们都拥护、支持和执行过的。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,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,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的错误,我也有份,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《决议》中对历史问题的批评,也是对我的批评。我们不能抱着“局外人”的态度。

毛泽东同志的错误,党作了决议,批评了他,我陆定一也犯了重大错误,没有人批评我,只好我自己骂自己了。

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,我的工作犯了很多“左”的错误,斗这个斗那个,一直没有停。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,我照办了,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。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,当然由我负全责。

社会主义建设,我们没有经验,全党幼稚,理论也不成熟。我们跟着毛泽东同志向前探索,很多东西是马列没有讲过的。探索的过程,有的成功了,是丰功伟绩;有的不成功,犯了错误。从思想深处说,对于毛泽东同志错误的东西,有些当时我并未察觉,是积极拥护的,以后才逐渐认识到。而对于有些错误,我感觉到似乎有些问题,但当时首先想到的,是自己又有哪些思想和观点没有跟上毛泽东同志,总觉得毛泽东同志几次挽救党于危难中,在重大的决策中都是正确的,毛泽东同志比我们高明,这次可能又是我认识上有错误。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崇敬和信仰,即使有不同意见,我也是跟着走。

在党内,我还是比较敢于说话的,但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被定为第一批反革命(修正主义)被打倒。党内的生活也不正常。

三、对林彪提出的“四个念念不忘”的反思

——阶级斗争还会出现,但斗争内容、方法已不同。

——无产阶级专政，一定要搞社会主义民主，是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专政。

——党的领导，有个党内民主和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样两个问题。党的集中，应以党的民主为基础；党是为群众服务，而不是群众为党服务。

——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要学习、继承与发展。

林彪提出四个“念念不忘”，欺骗性很大。当时无人看得出来，我也如此。现在十几年过去了，我们应从中接受一些教训。

林彪讲的第一个念念不忘，叫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”。他所谓的阶级斗争，就是对老干部、知识分子等搞残酷斗争，就是整好人。他从来不提搞经济建设、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、建设富强的国家。

在我国，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武装斗争，在革命成功之后是建设。这两种斗争形式，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，但内容、方法等有很大的不同。对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斗争，曾有过两种提法。一种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提的以思想分阶级，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，老干部都是“走资派”，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，知识分子是“臭老九”，等等。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。在打倒“四人帮”之后，又有一种说法，认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。我以为这两种提法都不对。把阶级斗争强调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说的那样，就“左”了，结果是十年浩劫；但是说剥削阶级消灭以后就没有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，那也不见得。赫鲁晓夫上台，是在苏联宣布消灭剥削阶级已经二十年的时候。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十年以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上台的，所谓“文化大革命”，难道不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吗？我们这些人没有被搞死，算是幸存者了。

在消灭了剥削阶级（我国是1956年）以后，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“论人民内部矛盾”的文章，这篇文章讲到反革命分子还有，但是不多了，阶级斗争会有时低，有时高，有时很激烈。我看这样的说法才是对的。

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，一面指出必须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余，同时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。他又指出了斗争的方法，说历来用搞运动的办法解决思想教育、制度改革问题，没有一次是成功的。这就否定了林彪的残酷斗争（方式）。

第二个念念不忘，叫“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”。对无产阶级专政，也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林彪“四人帮”搞的那一套，实际上是法西斯专政；一种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民主，是最广大的民主，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多几千几万倍，是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专政。但在实际上，从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以来，一提专政，民主和法制就被破坏了。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有时多一点，但有部分时间比资本主义还要少。实行社会主义民主，最重要的是选举和民主制度。当然，要达到选举，还需要一步步来。选举问题不解决，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就不能实现，一讲专政，就会不讲民主，不讲法律了。刘少奇同志是国家主席，可以随便抓起来，我们这些人更



不在话下,这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民主,还有什么法律,我们党究竟可以保证给人民以哪些自由?所以无产阶级专政,一定要搞社会主义民主,在民主的基础上搞专政。现在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,必须尽力解决的问题,就是如何实行社会主义民主。必须破除这么一种思想,以为一搞民主,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民主,就是“走资派”。

林彪讲的第三个念念不忘,是“念念不忘党的领导”。党的领导当然重要,但这里有个党的民主问题,我党的集中应是以党的民主为基础的;还有一个是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,是党为群众服务,而不是群众为党服务。至于党内,一般情况下应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度,只有特殊的情况下,需要党的领袖一个人或极少数人做出决定。毛泽东同志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一文中讲到,当时在退却的时候,群众反对,地方党反对,军队和干部也反对,这时需要集权到极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中来实行战略退却。这种情形,在军队大进攻(三大战役)中也要,在把“四人帮”抓起来的时候也要。军队打仗,要权力高度集中,但若以此为常例,结果一定是“个人专断”、“一言堂”了。在战争过程中的许多时候,特别是搞建设的时候,民主应该大大发扬。那时,讨论经济建设计划要有人拍板,研究外交上的重大决策也要有人拍板,集中是需要的,但是有时间在经过民主讨论之后,然后再决断。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,我们过去一讲党的领导,就过分强调统一,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与独立性,从来没有强调过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,从来没有一次反对过个人过分集权。我们这些人是搞专政出身的,往往一讲党的领导就强调集中,以致林彪一搞,就搞到“个人迷信”上去了。现在党内外还是民主不够。党内选举,有的是走过场。党内也要实行监察,有关组织一定要有权,没有权行不通。美国选举,两党可以互相骂,党内也可以互相骂。我们要有我们的一套批评和监督的办法。多少年来,我们对一些领导人不能批评,不能监督,怎么能行?^①

林彪讲的第四个念念不忘,是“念念不忘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”。在这个问题上,我还是提请同志们再看看《列宁选集》第四卷《青年团的任务》这篇文章。列宁说:“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、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。”也就是说,我们要继承人类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思想中的科学部分,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化。我们提倡“双百方针”,有人就害怕。有一篇报告文学作品《人妖之间》,我看写得很好。它是揭露大贪污犯王守信的,其中也揭露了我们党组织中的一些问题,牵涉一些干部,有些人就受不了了,组织反击。它是批评个别干部,不等于全体干部嘛,为什么要反击?

^① 1980年6月,陆定一曾向中央呈书,要求在修订新宪法时,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正式会议上的言论自由,列入到宪法保护中,强调对其有言论的“免责权”,使其受到法律上的保护,但此呈请没有被获准。(参见《邓小平年谱》)

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搞的“文化革命”，我说它是“文化反革命”，它是毁灭文化，搞虚无主义。他们只要法家，不要其他，事实上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得很。比如，老子尽管是唯心论，但也讲辩证法；孙子也是讲辩证法的。孔孟有些话还是好的，不能都不要。“四人帮”除了八个“样板戏”，什么都不要，毁灭文化，毁灭教育。我们有一代人因此没有受教育，不得了啊，你要出干部，没有文化基础怎么行？

所以说，念念不忘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也有两种解释：一种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那一套，忠字舞，早请示，晚汇报，念语录，简单化，形式化，搞思想愚昧政策；一种就是要学习，要继承，要发展。

此外，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条，我看讲得好。过去只讲经济，不讲民主，如果有民主，“四人帮”就不会出现。

四、惩治党内腐败问题要有外力

——惩治党内腐败，光有“自律”不成，还要加上“群众监督”和“舆论监督”的作用。

执政党的腐败，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。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后，就一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，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，监督和解决党员干部的腐败。但是，有一个问题始终摆在这里：反腐机构也是党领导的，它要听从党的指挥，如果党的领导人甚至一把手腐败了，那么该由谁来管？对这个问题，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。

毛泽东同志问：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，你们怎么办？”他老人家是主张用“大民主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方法去解决。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，人民活不下去了，采用“二次革命”的办法，推翻腐败政权，这是对的，历史上历来如此。但如果全党不是这种状态，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，那就不能去采用这种办法。在我们用革命的手段夺取了政权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，我们解决内部的问题，就不能使用这种手段来解决问题。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就是一个教训。此时专政的职能，主要逐渐转向对外，而对内部，则要建立民主政治，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来解决腐败问题。

靠“自律”解决党内的腐败，当然是个好的办法。利用党自身的力量和觉悟，加强自律，去克服腐败。

但从社会学和管理学的角度，光依靠自律，是不能彻底解决党内腐败问题的。反腐败中，自己既是“运动员”，又当“裁判员”，这就出现管理学中所说的功能缺失，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。就像“自我戒烟”和“强制（加外力）戒烟”一样，“自我戒烟”的成功率向来低于“强制戒烟”，就是因为没有外力。也像治病一样，小病可



以靠自愈,大病就一定要用“外药”,要外药和内力一齐作用,才能治愈。内部的毛病越严重,就越需要用外力。

从管理学的角度看,党的反腐败问题,其“裁判权”和“监督权”,一定要放在外部。在自律的基础上,再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,才能更上一层楼。反腐败的效果好不好,也要民众说了才算,而不是自己。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,权钱交易、权力资本化是一个重要现象,要增加反腐败的透明度、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,才能奏效。这种监督利大于弊,不要怕别人讲话。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,不要压制,压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要学大禹因势利导,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围与堵。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,都要妥善处理。对于执政的党,它掌握着全部的“政府资源”,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,才能有效消除腐败现象。香港的廉政业绩排在世界前列,其中有 80% 以上的案件,是靠外部的曝光和民众的举报。

要加强这两种监督,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“民主政治”建设。

五、党的“双百”方针应该用“二元论”来解释

——要历史地看待“反右”斗争。但“反右”搞“左”了,扩大化了。

——对待“双百”方针,应采用“社会属性”和“自然属性”的“二元论”理论来解释和执行,而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“一元论”理论来指导。

——在“社会属性”方面,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,应看其政治表现,而不应以思想划线。

——“社会属性”和“自然属性”中,自然属性是“第一性”的,社会属性是“第二性”的、派生的、被决定的。

——政策管理和“有为”、“无为”管理。

1956 年 4 月 27 日,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专题发言,毛泽东同志很赞同,并被拍板确定为是党的“双百”方针。毛泽东同志对“双百”方针是全力支持的,他的确希望我国的科学和文化艺术能有个蓬勃的发展。但到 1957 年,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有所变化。“反右”斗争后,虽仍一直提党的“双百”方针,但不能认真贯彻和执行了。

对“反右”斗争,要历史地看待。当时,国际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、“波(兰)匈(牙利)事件”的出现,引起了毛泽东同志高度警觉。国内少数人提出要“轮流坐庄”、又说党内的文艺政策是“五把刀子”。毛泽东同志发起了反击,但运动是扩大化了,整出几十万“右派”。哪能有那么多反对派呢?而且大多数是知识分子。毛泽东同志也认为是少数人,但是各地把这作为政治指标,相互攀比,没有也要抓它几个。运动“左”了,扩大化了。20 世纪 60 年代初,中宣部和相关部

委，曾专门发了一个文件，让重新甄别和复查原定的“右派”，想纠一下偏，但是没什么效果。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胡耀邦同志发文给“右派”摘帽子，发文中仍附上了原来的那个文件，这次却管用了。

“反右”斗争中，我“左”了，我要给许多同志赔礼道歉。当时我认同了毛泽东同志对知识分子的分析。“三大改造”完成后，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已经公有了，但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消灭，毛泽东同志讲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，是说来原依附于资产阶级“皮”上的知识分子，在资产阶级消灭后，依附到无产阶级这张“皮”的问题，但还没有最终解决。毛泽东同志认为，他们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，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，故阶级的划分，要以思想来界定。我想，就拿我这个知识分子的老党员来说，虽受党的多年教育，也常有错误思想，也是要不断进行学习和改造的，能不能最终成为共产主义的一分子，也是要最终“盖棺”才能“定论”的。我信服了毛泽东同志的分析，并且是全心全意照他的意见去做的。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分析，后来又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扩大化和升级，变成划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依据；他们把凡世界观中带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人都当作阶级敌人，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都当作阶级敌人，进行“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”，实行法西斯专政。我虽认同毛泽东同志的分析，但是在具体执行中，我认为要把政治问题与思想认识问题严格地区分开来，并认为这是思想性问题，是属于团结、批评、教育和改造的范畴，而不能用阶级斗争、专政的办法来解决。这是我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不同的地方。章、罗说要“轮流坐庄”，但并没说要打倒共产党，是我们硬说他们要打倒共产党，登在报纸头条。他们只是想套用西方民主政治的那一套，而对这些人，我们是可以教育改造的。

本来我的认识已经“左”了，后来越来越不理解，跟不上，直至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我成了“绊脚石”，被关进了监狱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被关押的十三年中，我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批判我的所谓《反动鸣放纲领》（即关于“双百”方针的讲话）进行了反思。通过十三年的反思，我愈来愈意识到：对“双百”方针的理解，应该用“二元论”来解释。世界观的转变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在这一个长期过程中，如何去看待知识分子，如何去贯彻执行党的“双百”方针，是一个重大的问题。否则，一旦有个“风吹草动”，可能又会爆发个第二次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“双百”方针，从字面上好理解，但要从理论上理解，恐怕首先要分清是用“二元论”来解释还是用“一元论”来理解的问题，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定位，这么两个问题。

对于“双百”方针，我认为应采用“社会属性”和“自然属性”这“二元论”的观点来进行解释。

同样，在“二元论”的“社会属性”方面，又有个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。是以思想（世界观）划线，还是以政治表现划线，这涉及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